

委员笔记

名家名笔

文明的印记

王元青

在我今年参与的几次全国政协专题调研中，不管是聚焦“推动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主题，还是围绕“推动文物科技创新”主题等，都流淌着文明的印记。

丁村、陶寺、仰韶、二里头、双槐树、裴李岗、大河村、殷墟……众多的发现，“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调研所到之处，无不具有深深的文明印记，让我再次受到中华文明史的教育，对创造和传承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先民们的钦佩和敬仰油然而生，也为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而自豪。同时，在考古遗址，听着考古工作者的现场讲解，我不仅了解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更被广大考古工作者在艰苦条件下的严谨治学和奉献精神所感动。

我们所调研的地区——山西、河南、陕西等——都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文物数量多，文物研究、保护和展示也走在全国的前列，对科技手段的应用成效显著。因此，调研工作获得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参观了不少博物馆，包括不同类型的遗址博物馆，例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殷墟博物馆等。各博物馆依托丰富的展品，采用现代的技术手段为观众营造了良好的观展环境，带给观众令人难忘的观展体验。众所周知，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多年，目前仍具有强大的活力与生命力。我不禁想到，如何才能将这些遗址博物馆展示的不同阶段的中华文明综合起来，整体呈现给观众？这可能需要一些综合性博物馆发挥作用，来更好地展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传承至今的过程，以及中华文明对当今的价值与影响，以彰显

中华文明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礼仪之邦”。“礼仪”的传承与发展，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小到人与人相处，大到国与国交往，礼仪不仅仅是表面的形式，更体现在实际行动中。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包蕴非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深入发掘并继承发扬，将让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更加绚烂多彩。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与过去被归为文史类学科的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考古学研究已经成为融合人文科学和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等多个自然科学分支的交叉学科。山西陶寺遗址中国最古老观象台遗址的发掘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的时代，学科发展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当前一些高校的文博学院仍然按照文科类别招生，显然与学科发展新形势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不相适应。国家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在文博领域特别是地方文博机构中还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多年来县级等基层文博单位的专业人员队伍呈现萎缩趋势，甚至影响一些单位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构建适应文博事业发展的培养体系，如何构建从科学研究到保护展示、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文博领域的组织和人才体系，如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是文博领域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过程中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调研过程中，在多次与一线文博工作者的座谈交流中，都听到了建设



▲考古发掘现场

文博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呼声。相关专家也强调了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必要性。在我看来，文博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需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做好顶层设计，以引领学科发展为目标，在引进自然科学领域先进技术手段的同时，引入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创新发展文博领域自身的理论体系，为高水平的研究工作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促进全国的文博事业健康发展，为文博领域的学术和技术交流搭建平台。

文明的印记，需要在科学研究中探寻，也需要在科学普及中传承。置身于河南博物院、殷墟博物馆等熙熙攘攘的观众群中，我想起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与曲伟、徐星等多位委员提交的联名提案，建议进一步推广青少年科普主题出版读物，提升青少年科技素养。科学普及是一件很有意义且

有着深远影响的事情。好的科普读物，不仅可以传播科学知识，还可以给读者以启迪，帮助读者提升综合科学素质和甄别判断能力。这一点在信息爆炸的当代，面对打着科普的旗号或幌子传播非科学甚至是伪科学的信息时，尤为重要。让青少年走进科学、热爱科学，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国家未来发展意义重大。文博领域的科普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任重道远。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中华文化，沿着文明的印记，我们走进历史深处，又来观照现实，在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中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与迎接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安徒生的意义

高洪波

安徒生已经220岁了，他被称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一个苦命的鞋匠的儿子，一个几乎成为孤儿的小男孩。他14岁只身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17岁发表诗剧《阿尔芙索尔》，然后进入斯拉格塞塞文法学校和赫辛欧学校免费就读，5年后又升入哥本哈根大学。他一生发表了160多篇童话，每年圣诞节都为孩子们写本童话，他的书已经被译成150多种语言在各国出版。安徒生的一生几乎是个奇迹，在我看来，他的著名童话《丑小鸭》就是对自己生命的一次童话写照。

安徒生的意义，诚如郑振铎先生在《新月集》的“译者自序”里所写过的一段话：“安徒生的文字美丽而富有诗趣，他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能把我们从忙扰的人世间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虫的世界、人鱼的世界里去；能使我们忘却了那一切艰苦的境遇，随着他走进有静的方池的绿水，有美的挂在黄昏的天空的雨后孤虹等等的天国里去。”这已经是一个世纪前的对安徒生先生的评价了。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仍在与丹麦朋友的相聚中谈论令人骄傲的安徒生。我个人感觉安徒生的意义在于，一是童话与童年的互动关系。因为童话对一个孩子来讲，是他生命快乐的重要来源，是他想象力的培养基础，也是他未来成长的精神蓝图。二是安徒生与童话的特殊关系。他是把自己悲苦人生中的自我释放与解脱、作家的思想与人格进行成功诠释的一个范例。

记得我在云南从军的日子，曾经无意中得到一本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选集，其中他写了一批世界级的作家和艺术家，这本书后来又被翻译为《金蔷薇》。在书中有一篇《夜行的驿车》，写的就是安徒生的故事。巴乌斯托夫斯基写到安徒生在一个黑暗的夜行的驿车里与一位贵妇及几位乡下姑娘的相遇，他为三位乡下姑娘一一预言了她们各自的未来，安徒生的描述让乡下姑娘们感动不已。最后黑影中的那位贵妇突然说道，你应该就是诗人安徒生。小说的最后，这位贵妇想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这位了不起的诗人，安徒生谢绝了。事实上他终身未娶，他把自己的爱交给了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们。这篇《夜行的驿车》的故事之深刻、语言之丰富，以及对安徒生形象的刻画之生动，在我青年阅读的榜单中居于榜首。所以巴乌斯托夫斯基就这样也成为我终生致敬的大师，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那辆迷人的“夜行

的驿车”。

我们为什么需要安徒生？有了安徒生的存在，我们的眼光才更加深邃，我们的情感才更加细腻，我们的世界才更加丰富。了不起的安徒生用他的《小锡兵》《海的女儿》《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陪伴着无数孩子童年的阅读时光，特别是他著名的《丑小鸭》以及更著名的《皇帝的新装》成为人类阅读史上不可替代的经典。

之所以我们需要安徒生，是因为他是每一个孩子精神成长的需要，也是每一个孩子在成长中爱与阳光的巨大能量补充，更是慈悲与智慧的双重营养源。了不起的安徒生，这颗“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我们所有人的童年，而且一照200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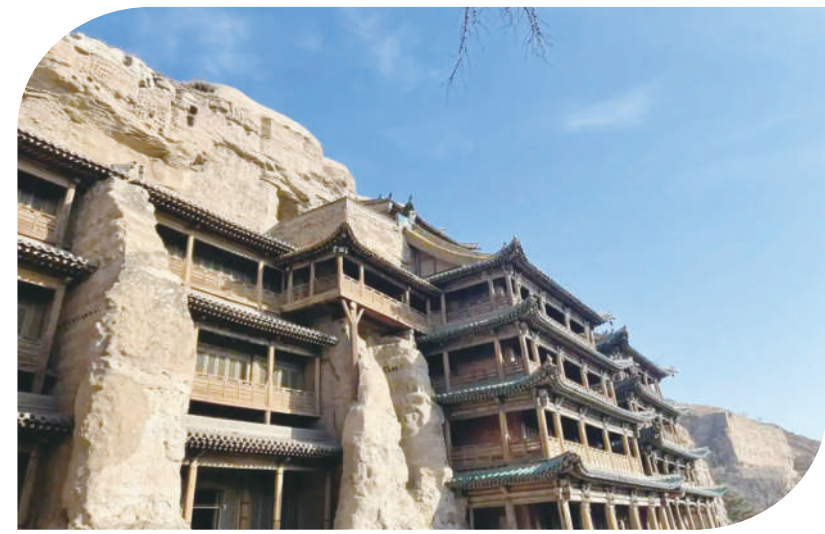
致敬安徒生，为中国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我见我闻

云冈遐想

冯并



▲云冈石窟

中国的石窟石刻我大多看过，唯有云冈石窟没去过。奇怪吗？不奇怪，因为那里离京城很近，这或是所谓“灯下黑”的心理效应使然吧。当然迟迟去看，也有一个自造的理由，即重头戏在最后头，也许是个更好的安排。再说，云冈石窟的照片和资料介绍已经看过不少，似乎闭着眼也能想到，那里的佛教造像如何美轮美奂。但云冈石窟终究是要去的，去了才会有新的发现和心得。

无书不可，尽信书也不可。理想的状态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行万里路”需要摆在前面，不亲自去看、去比较，怎会有新的体验？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毕竟是我自小听到的最有道理的话。

按照云冈石窟造像的时间顺序去参观，首先就是开凿最早的昙曜五窟。昙曜五窟都是高达数米的单独石

佛造像，其中一窟外围坍塌，形同露天像，看得更为真切。五座造像很是生动自然，每一座造像都面带一丝微笑但又尽显威严，也有手印，但一律是并指弯曲向上，并没有佛陀坐像常有的那种各色手印和坐姿，也没有陪像，很人性化。这种形象在石窟艺术和寺庙艺术中恐怕是独一份的。

据比较确切的记载，建都于平城即后来大同的拓跋部，一开始并不信仰佛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让北凉三万户军民迁往平城，其中就包括了本应还俗的僧人昙曜。昙曜少年时代就在佛教流行的凉州出家，对中国最早的具有多种古代宗教因素的武威天梯山石窟自然很熟悉。到平城后，他一直坚持没有还俗，并逐步取得拓跋焘继承者文成帝的信任。昙曜采取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即把人间帝王的至高权力与佛的无边法力统一

起来。他向文成帝建议，何不把北魏王朝的五代祖先刻画成高大的石佛，尽显北魏君临天下的神威。这个既对佛陀礼赞又能树立北魏皇家权威的建议被文成帝采纳，于是兼为皇家寺庙的昙曜五窟如此这般横空出世了。

接着就是北魏后来开凿的华美石窟，色彩很艳丽，形制也多样，出现殿堂式石窟的多种形式。在这些石窟中，有突出主像中将神态各异的大小佛像凿刻在四壁，也有佛陀说法弟子会心微笑倾听的生动场面，但绝无供养人形象的出现。由此可以判断，这依然是北魏的皇家独家工程。有些壁龛和彩绘的图案出现了飞天和乐人，无疑也是古代帝王们心目中更理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敦煌莫高窟中的某些元素，但似乎也有武威天梯山石窟的某些因素，但最显眼的是在佛教世界里象征未来的弥勒形象的出现，在五彩缤纷的粉饰里，尽显北魏皇家的气派和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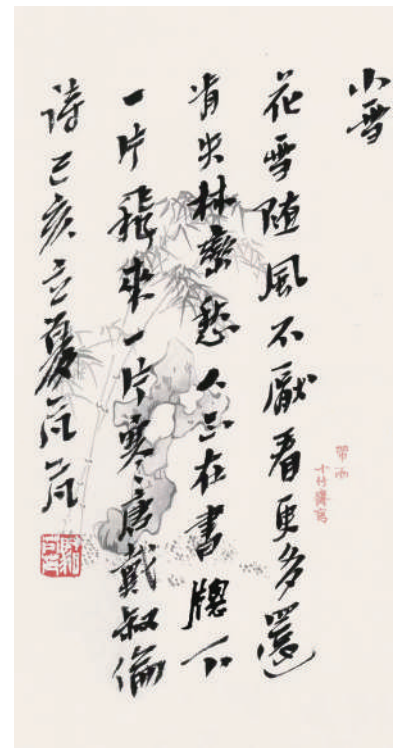
一般来说，自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云冈石窟皇家开凿的历史就结束了。从南北朝到唐代，重要的皇家石窟有三处，一是云冈石窟，一是龙门石窟，一是北齐开凿的响堂山石窟，其余大多都是地方性政权倡导和民间开凿的，连最有名气的莫高窟也是如此。具有商业象征意义的是，因为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的巨大影响，石窟和石刻艺术遍布在中国南北东西的商道上，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显在地标。在丝路通衢和要路口，只要石质适合雕刻，那里就会有大大小小的石窟、石刻和石室。云冈石窟在北魏皇家营造工程结束后，其自身的营造并没有完全结束，民间自发的石窟造像依然延续了

很长时间，不过这些石窟造像相对规模较小。我看了几处，造像人物一般很清秀，也出现了很多供养人。

站在云冈石窟几组代表性洞窟前，特别是仔细观察营造时间最晚的一组洞窟，我不禁有些浮想联翩。比如，石窟里供养人的有无，是判断石窟是官办的还是民间自发的一个重要指标。还有说法认为，造像清秀与造像丰满，是区分北魏与盛唐造像的标准，在我看来似乎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号。看看云冈石窟的分期造像，分明显示着不同动机和不同情况下造像风格的差异。在昙曜五窟一期造像里，需要显示的是高大威猛又可亲近，彰显拓跋游牧部族王者君临天下的佛陀与人间的具象，哪里见得出一丝一毫的单薄和清秀呢？真正出现清秀的造像，倒是北魏后期民间石窟中的作品居多。其间有真鼻形象，一看就是西来之人，它们或是“胡商”所开凿，但带有本土气质特征。佛教产生于古代尼泊尔，但东传的平台确乎在今天巴阿交集的犍陀罗文化地区，因为这里曾是希腊文化影响多年的地区，无疑会伴生西方文化的一些因素。但这些复杂文化因素的携带者，除了工匠，更多来自“胡商”。他们一般没有富可敌国的财力，更缺少行政动员力和组织能力，所以其开凿和雕刻的石窟，自然要比皇家石窟简约许多，而清秀的形象正是北魏石窟造像后期的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更多是民间石窟的形象特征。

此番看过云冈石窟，不仅再次拓宽了文化眼界，也让我更加信服了南宋诗人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一诗中吟过的那句诗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二十四节气之小雪篆刻书法作品 骆芃芃 作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名誉院长)

诗书画印

